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阶级、组织基础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情

一、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黑暗统治的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东方乃至全世界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却大大落后了。经济停滞，政治腐败，中国社会的机体十分脆弱，政治组织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异常落后。这主要是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造成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得中国依然停留在私有制的小生产、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水平上；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得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儒家教条及八股取士和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文化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创新精神；统治阶级日益没落和腐朽，大小官吏只知文恬武嬉，醉生梦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列强侵略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它们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种种手段，侵略中国，掠夺中国，并且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结合起来，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使独立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资本主义列强曾向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如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战争，1904年的日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旨在掠夺中国的战争等等。列强用战争打败中国后，便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及许多其他特权，并在中国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等。

——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华大量推销他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并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侵略者的需要。

——资本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开办和经营了许多工矿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丰富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大的销售市场，榨取高额利润，并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多方面的排挤和经济压迫，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在金融财政上也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侵略者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

大众。

——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同盟，扶植地主阶级，使其成为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并使封建的朝廷变成洋人的奴婢。为此，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剥削形式，保持其生存的基础，支持和保存封建势力及其官僚的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大量的军火和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收买和操纵中国的军阀势力，造成中国长期的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并利用它们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资本主义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办法，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

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混沌的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横贯东西南北的各派军阀，它们各自寻找帝国主义列强为其后盾，构成了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社会的反动统治的政治格局。〔1〕

北方：直隶派的吴佩孚——倾向美国

奉系派的张作霖——倾向日本

中部：安徽派的段祺瑞——倾向日本

南方：广东派的陈炯明——倾向英国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报刊就曾悲愤地揭露过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肆意掠夺中国的种种手段和暴行，痛斥封建军阀丧权辱国的种种可耻行径，把列强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悲惨情景呈现在人民面前，令人触目惊心。这种社会状况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使他们看到中国已陷于“谓

之不亡不可，谓之亡亦不可”的境地。这是因为，如果说中国没有亡，可是它的许多主权却是属于外国的，外国列强可以任意掠夺和奴役中国；如果说中国已经亡了，可是它在名义上却仍旧存在。这便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的写照。我们的祖国在被野蛮地蹂躏和践踏，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各地风起云涌，彼伏此起，从未间断。这也是帝国主义未能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人民由于仍然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的状态之中，中国社会依然是散沙一盘。中国人民自发的斗争，还不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局面。

二、畸形的中国政党政治

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产生了一些党派,它们有主义,也有纲领，这比军阀政治要进步一些。但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况，却决定了各党派的幼稚性；有的则完全是反动的。透过它们的各种行动，可以看到，中国土地上产生的这些党派，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政党相比，要落后得多。

20世纪20年代，各党派无论其动机如何，由于其自身的软弱，也由于其自身的根本缺陷——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在实际上无不想依靠某一帝国主义列强及一派军阀的力量而求生存、谋发展。1923年8月1日出版的《少年》杂志第7号发表文章，把这时的党派、政治势力，概括为十大类：

(1) 新兴的实业家
(2) 全国大部分商会
(3) 教育界大部分
(4) 进步党
(5) 基督教徒

——倾向吴佩孚——美国
（反对张作霖、段祺瑞——日本）

(6) 广东香港商人
(7) 益友社

——倾向陈炯明——英国

(8) 交通系 ——倾向张作霖、段祺瑞—— 日本
(9) 安福部 （反对吴佩孚——英国、美国）
(10) 国民党

前五派的共同纲领或口号是“教育实业救国”。它们已经看到并深深地感到，军阀的存在是妨碍实现其纲领的障碍物。他们反对军阀政治。但是，他们矛盾的心理、微弱的经济地位和缺乏群众基础，使得他们始终想巴结一个“较好的”、最有力的军阀来制服别的军阀，统一中国，让他们来发展教育和实业。

广东香港商人都是商业资本家，他们一方面依赖英国银行家的资本，另一方面又极力排斥日货。益友社分子原是国民党党员，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较优越，趋向于保守倾向，与国民党脱离而与联省自治派的军阀结合。这两派的经济地位都较优越，不可避免地有反对革命的心理。

交通系完全由一帮卖国的官僚组成，他们从清朝末年以来就利用盘踞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国家财政机关的便利，通过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手段，达到他们争权夺利的目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列强，他们都愿意巴结。安福俱乐部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一手培植的，他们羡慕交通系的荣华富贵，想利用政权夺取交通系，窃据国家财政机关，以形成新的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等人，都是交通系的代表人物。这两派竭力反对国民党，虽然一度与国民党合作，也只是由于吴佩孚的强制所造成的一时现象。

这些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控制和操纵之下的中国社会，很难产生具有独立意义上的政党。所有的旧式政党，无一例外地把广大人民群众抛在一边，至多也只是以救世主的眼光同情他们而已。

这时，只有国民党，尚有革命的倾向，同情国民，并且是唯一的具有革命倾向的政党。但是，20 世纪前一二十年的国民党，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想涣散，组织松懈，同人民群众缺乏真正的联系，因而难以有所作为。

三、思想涣散、组织松懈的国民党

1905年,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其组成分子为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虽然各有特点，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却是其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也才有联合的可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华兴会、光复会两派的人以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可以终止革命工作了。孙中山虽然知道革命尚有未竟之功，但却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假共和所迷惑，把临时大总统的职权让出去，自己专心搞建设。不久，同盟会在宋教仁、黄兴主持下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而成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想借议会政治掌握政权。1913年，国民党经过苦心争取，终于在议会中占了绝对多数，但却引起了袁世凯的忌恨。袁世凯联合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成立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并极力破坏国民党。国民党经受了反动势力的种种摧残和压迫，各省的国民党督军均被裁撤，宋教仁遭到杀害，国民党被解散。反抗袁世凯失败后，孙中山又号召国民党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组织反袁斗争。当段祺瑞代替袁世凯以后，孙中山看到中华革命党因自身分化在护法斗争中失去作用，决定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以招党众，为建设真共和继续斗争，并于1919年正式改名“中国国民党”。但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因政策失误，致使十余年的辛勤努力毫无结果。这些政策失误集中表现在：第一次，国民党采取议会政策，扩充组织，发展党员，竞争选举，但是，对于党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党的组织和训练教育等问题，竟然未加注意。虽然在议会中占了绝大多数，但是，一经反动当局

压迫，就迅速解体。第二次，是国民党鉴于议会政治的失败，而改用军事行动，想借助武力打倒敌人。但是，国民党本身却又没有可依靠的军队，它的军事行动，不过是收买退伍军人，网罗各地会门和山大王，以图暴动，争夺地盘。对于国民党所应重视的主要工作——组织和教育、训练、宣传——却仍然没尽丝毫努力，党内依旧是一盘散沙。国民党尽管在国外进行了改组，但是，改组之后的党的工作方法却依然照旧。致使国民党的旗帜和纲领——三民主义，不仅广大群众一无所知，即使国民党成员也多是不明真谛。国民党努力于军事行动时，太多依靠了个人的权力，如陈其美在 1913 年后于上海举行两次讨袁起义，均告失败，1916 年被张宗昌遣人刺死，其全部军事行动归于失败。第三次，军事行动这条路没有走通，便改换途径，联美联日，想借帝国主义的帮助推翻军阀统治。帝国主义是不会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当然不可能给以援助。国民党的联外政策，又归于失败。第四次，与帝国主义联合失败之后，国民党便走上了与军阀妥协，利用甲派军阀去倒乙派军阀。这时，国民党内持有兵权的党员，多与军阀的行径一样，对于中国的政局来说，却只能造成军阀嬗变的局面。尽管孙中山殚思竭虑，四处奔波，却终无效果。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一直没有懂得：国民党本身的状况（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如何，决定着革命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的这些失误，使国民党成了一个脱离国民的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民运动，迫切需要有一个组织力强、纲领明确、有影响的党来领导，否则，就无所谓国民运动。国民党并没有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党。当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表现出来的时候，当国民运动发展起来的时候，却再也看不到辛亥革命时期那种富有朝气的革命党人了。1915 年，在国民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没有国民党；1919 年的五四运动，学生也忘却了国民党；其他运动也显现不出国民党的力量。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运

动中没有国民党党员参加，相反，有的国民党党员坚决而热烈地参加了这些运动，但国民党没有作为一个组织参加进去。国民党与国民的脱离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用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 1922 年 10 月 10 日，这本来是国民革命纪念日，在北京召开的双十节纪念会上，学生、工人到会者达几千人，却连创建了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都没有提起；二是 1923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大会，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参加了大会，然而他们居然没有亮出自己的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与军阀有联系。这时有人说：这是一个“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2〕这是一个真实的概括。

这时，在中国众多的党派之中，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的救国方案，基本上属于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却是无一走得通，无一能实现得了，一一遭到了失败。绝大多数的政党，其政治纲领不适合中国国情，找不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又严重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先后都泯灭了。就连这时有一定革命性的国民党，也日益陷入了绝境。

第二节　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兴起

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的分割、侵占和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实在不能生存下去了，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增长。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

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壮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只有 60 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等，也不过 100 多万。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工人却增加到 200 万人左右。[3]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上各国的工人阶级所具备的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特点以外，还由于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高度集中。中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又集中于矿山、铁路、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 500 人以上的大企业之中，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2）受压迫最重。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的多重压迫，工资之低、劳动时间之长、劳动条件之差，都是世界上罕见的。因此，他们革命起来比任何阶级都更坚决、彻底。（3）与农民联系密切。中国工人大多出身于破产农民，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在斗争中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这些特点，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增长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益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2 年至五四运动前夕，工人罢工达 100 多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912 年 14 次；1913 年 11 次；1914 年 11 次；1915 年 8 次；1916 年 17 次；1917 年 23 次；1918 年 30 次；1919 年 5 月前 19 次。[4]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罢工的形式和内容也有了变化，从最初的反对外国技师、监工、中国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剥削，维护最低生活条件的自发经济斗争，发展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

加革命。像天津工人保卫老西开那样大规模的爱国大罢工，仍然避免不了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现代工会，工人的组织多半是一些秘密结社的帮会和封建式的同乡会等团体，它们不可能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和组织工人进行自觉的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需求有自己的司令部——先进政党来领导斗争。

其次是农民运动的发展。

民国以后，封建军阀的残酷掠夺，农村的土地更加集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两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地租和高利贷的加重。农民遭受着封建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层层盘剥，一般占收获物的五成被剥削去，甚至还形成超经济剥削。在重租重利的盘剥下，加以天灾人祸，广大农民被推上了死亡的边缘。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民的斗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起义，但却此伏彼起，持续不断地发展着。其中规模较大的是 1912—1914 年的白朗〔5〕起义。白朗起义军兴于河南，转战于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省，以“打富济贫”、“建立完美之政府”为口号，并积极参加讨袁斗争，1914 年改称为‘公民讨贼军’。孙中山曾致函白朗，与之联络。袁世凯动用很多兵力，才把它镇压下去。白朗起义军是对封建军阀统治秩序一次有力的冲击。

白朗起义军失败后，1916 年湖北、江西两省哥老会发动斗争；1917年安徽省大刀会起事等等。

和以往的农民起义一样，这时的农民斗争仍处于自发状态。有的农民起义军毫无组织，有的则以封建迷信来号召。这种旧式的农民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再次是城市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的斗争。

其中较著名的有 1915 年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 年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1918 年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

密约的斗争等。

这些斗争也仍然是缺乏领导的自发运动。以 1915 年反‘二十一条”斗争为例，以中华革命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远远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城市工商业者从本阶层的狭隘利益出发，企图把这个运动限制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范围以内。青年学生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对于究竟应把这个运动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的问题，他们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显然，仅凭城市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持久的成效的。

最后，还有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例如，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封建压迫和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城市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群众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有着共同的目标的。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然而，这个目标并没有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这时也没有哪个党派刻意地欲将此目标化为群众的自觉意识。

二、五四爱国运动凿通了先进人士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孔道

辛亥革命，推翻了相沿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长期积淀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深层心理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代可换，皇帝不可无”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了，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国民都应是国家的主人，而不应是皇帝的顺民和仆役。袁世凯的皇帝梦和张勋的复辟阴谋因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反对而失败，绝非偶然。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的原有的封建传统观念又一次受到了荡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15 年 9 月创办的《青年杂志》于 1916 年改名为《新青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已经不是老式的秀才。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最初回避了当时反对军阀政治的实际斗争，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没有使这一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主要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没有把运动及时地向广大的工农群众推开，这就大大缩小了它的战斗力。一部分人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崇拜，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新的出路。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先进人士，继续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努力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希望的曙光。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天,即 19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就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字样，报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 年 7 月至 1919 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先进人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尤其对于劳动群众认识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说：“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

不可’。〔6〕一时间;‘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颇广。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 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新青年》编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新文化运动从宣传资产阶级文化转向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

总之，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先进人士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这便成为新的革命运动来临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先进人士只是从遥远的十月革命中感到了劳工的力量，那么，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事实，则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级的力量。

1919 年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运动，起先是青年学生运动，到了 6 月 3 日以后，运动的主力从学生转为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6 月 5 日,上海的工人相继罢工,支援学生的爱国斗争，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上海市内外交通断绝。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地，在全国人民爱国运动高潮的影响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商业者，也相继罢市。

全国人民反帝爱国主义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的罢工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同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并肩战斗，亲身感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威力、认识了它在革命中的

地位和作用，世界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吴玉章回忆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军官、政客、议员…… 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他还说：“以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经过五四运动，才真正懂得‘要依靠工人阶级’。[7]这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孕育的最大精神成果，它改变了以往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格格不入”的状态，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以救世主的眼光可怜下层劳苦民众的习惯。五四运动把中国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与工人群众之间联络的“孔道凿通了。[8]

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先进人士对党的认识水平与主要建党活动

一、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人士积极研究、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传播是逐步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的。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组织讲演团，开展平民教育。五四运动以后，先进人士走向工厂、农村，进行讲演活动。起初的目的是教育人民，

其明白革命的道理。后来，通过实践，终于也使他们自己明白了许多道理。北京大学的讲演团于 1920年 4月，出发到京郊工厂、农村，并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建立了固定的宣传阵地。深入工厂、农村之后，他们万分感慨地说：“一到工人中间，就觉得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少。”[9]讲演活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工人群众的初步经验，使他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要改造社会，自然要向工人阶级传播革命道理。

第二，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状况，社会调查的结果，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自己。1920 年 1月，李大钊组织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分组到人力车工人的住区进行调查，调查之后，他们大为震惊，大家相顾失色，叹息不止，表现出一种极为伤心且不平的样子。这一方面说明“五四”以前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下层工人的状况是多么不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调查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深刻影响。

第三，与工人一道纪念五一劳动节。 1920 年 5 月 1 日，我国工人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劳动节纪念日，全国举行纪念活动的城市不下七八个，不少地方是在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指导下进行的。

第四，影响或指导工人建立工会组织。例如，1920 年 4 月底，上海码头工人成立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陈独秀曾出席成立大会，并作《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

第五，旅欧勤工俭学。勤工俭学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自己就是劳工，因此比其他形式更有利于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赵世炎所在的法国克鲁梭施乃德铁工厂为例，这个工厂有 3万多工人，其中华工 1 万多，有 100 多位勤工俭学人员在这里劳动。他们与工人一样干活，受资本家的剥削，受失业的威胁。他们与工人交朋友，办工余读书班、华工周报、消费合作社等等，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的道理。

第六，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1920 年秋冬，他再次举办工人夜校，从传授文化知识灌输爱国主义为主，发展为注意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10〕武昌、汉口、长辛店等地也纷纷开办了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七，办通俗刊物。上海有《劳动界》、《机器工人》、《友世画报》；北京有《劳动者》，长辛店工会还出版了《工人周刊》；济南有《劳动周刊》；广州有《劳动与妇女》。创办通俗刊物，目的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武装工人阶级。它恰好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愿望，颇受工人欢迎。一位印刷工人说："同情我们的思想家，他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觉悟的一天，我们应感谢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朋友"。〔11〕一位电灯工厂的工人说："我们同伴工人，多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有了它，"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诉了"。他称《劳动界》是"我们工人的喉舌"。〔12〕长辛店的《工人周刊》也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3〕

第八，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罢工。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重大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工人运动日益紧密相结合的过程中传播开来的。

二、中国先进人士对党的认识和建党主张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促使工人运动的高涨，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有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努力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同工人一起进

行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剖析、批判。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工人在斗争中，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的要求日益迫切。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就是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在中国，最早进行建党活动的是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14〕等。他们从事建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必然进行的工作。他们的建党活动，大体上经历了：建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团体；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小组；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积极的筹备，促成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建党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他在 1920 年 1 月，由北京去上海途中，就同护送他的李大钊商讨了建党问题。到上海以后，即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在共产国际东方局派出的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于 1920 年 5 月至 8 月之间，经过多次酝酿，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党组织的建立，即后来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实际上起着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在陈独秀、李大钊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动下，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重庆及苏俄、东京、巴黎等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党组织。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陈独秀、李大钊的建党思想是很明确的。他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文献的精神，考虑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的主张，坚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